

# 简论伊朗国际商事仲裁法的发展

陈 熊

(武汉大学 国际法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加入《纽约公约》后, 伊朗必须履行公约义务, 对国内法中与《纽约公约》不符的地方进行修改。另外, 伊朗又是一个地区大国, 与中亚邻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联系, 很有希望成为该地区的仲裁中心, 但伊朗仲裁法律制度中一些不合时宜的规定限制了他在国际仲裁舞台上的发挥, 对这些规定进行修订也势所必然。

**关键词:** 仲裁; 纽约公约; 示范法

**中图分类号:** D9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951(2010)06-0114-04

\*

我国仲裁界向来重视对欧美发达国家仲裁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原因不外乎两点: 一则欧美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 绝大多数国际贸易争议产生于中国与欧美当事人之间, 了解甚至掌握这些国家的仲裁法为国际商事交往的实践所急需; 二则欧美发达国家仲裁理念先进, 仲裁立法也比较完善, 可作“他山之石”, 以为我国仲裁法的发展所借鉴。相较之下, 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仲裁立法则关注不够, 国内相关研究更是寥若晨星, 事实上, 像伊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也是我国商品、服务以及投资的重要输出国, 了解其仲裁立法对于我国对外经贸交往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一、伊朗仲裁法的早期发展

“如果一对夫妻害怕婚姻破裂, 请任命两个仲裁员: 一个来自妻的婆家, 另一个则来自妻的娘家……。”<sup>[1]</sup>

这是一段来自伊斯兰经典《古兰经》的古谚, 而《古兰经》成书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可见非诉讼争议解决机制早已根植于伊斯兰文化之中。实际上, 在伊朗偏远的乡村, 以村中智者和头面人物作为争议的公断人是唯一可能且可行的争议裁判方式。近现代以来, 伊朗政府虽一直致力于法律制度和法律体

系的现代化, 但以仲裁作为重要争议解决手段的传统一直存在。现代立法者也并未以任何方式否定这种民间传统, 伊朗最早的成文法典甚至以官方名义承认民间仲裁的合法地位<sup>[2]</sup>。如1911年的伊朗《民事诉讼法》即承认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的有效性<sup>[3]</sup>, 1928年该法的修订版则规定无论当事人之间是否订有仲裁协议, 争议的任一方当事人均可将争议提交仲裁, 即使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也不妨碍仲裁程序的启动<sup>[4]</sup>。这些在今天的学者们听来“骇人听闻”的仲裁规则于当时却有一定的合理性: 其一可以缩短争议的解决时间, 把尖锐的社会矛盾消灭于萌芽状态; 其二则可以减轻伊朗当时新建立的司法机构的诉讼负担; 其三还能消除外国人士对伊朗法院裁判的独立性和公正性都不甚信任, 采取仲裁的方式解决争议可以较好地避免这种尴尬。一年后的1929年, 伊朗再次修改了《民事诉讼法》规定婚姻及破产争议不能以仲裁的方式解决, 同时当事人应在某些特定种类的争议, 如商事争议中, 达成仲裁合意才能将争议提交仲裁。后来直到1935年伊朗才在最终确立当事人间的“仲裁协议乃是一切民商事仲裁程序启动的前提条件”。伊朗现代仲裁法的基

\* 收稿日期: 2010-05-30

作者简介: 陈熊(1979—), 男, 湖北襄樊人,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基础性原则最终奠定于 1939 年的伊朗《民事诉讼法》此后该法仅在 1983 年的修订中作了小幅修改。可以说, 伊朗 1939 年《民事诉讼法》对仲裁的规定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 比如该法规定了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应具有充足理由、仲裁条款的独立性以及仲裁一裁终局性等今天依然坚持的仲裁基本理念, 其中第 649 条甚至对仲裁庭的“破裂”问题也有规定。目前, 伊朗《民事诉讼法》仍然调整争议当事人于订立仲裁协议时均为伊朗公民的纯国内仲裁案件。

伊朗已于 2001 年加入了联合国《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习惯称为《纽约公约》), 根据条约必须遵守国际法原则, 《纽约公约》框架内的外国仲裁裁决应依公约规定的条件在伊朗执行。但在伊朗未加入《纽约公约》前的相当长时间内, 外国仲裁裁决在伊朗被视同为外国法院判决, 因此外国仲裁裁决在伊朗被承认与执行亦须满足伊朗法院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条件, 而外国法院判决在内国得到承认与执行是非常困难的。伊朗加入《纽约公约》在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上前进了一步, 因为现在公约框架内的外国仲裁裁决只需满足公约规定的条件即可在伊朗法院被执行, 如果伊朗法院无理拒绝申请人的请求, 伊朗将可能因违反条约义务而承担国际责任。

## 二、伊朗 1997 年《国际商事仲裁法》

伊朗于 1997 年 9 月 17 日经议会批准正式颁行了历史上第一部单行仲裁成文法典——伊朗《国际商事仲裁法》。伊朗官方称该法最大限度上沿袭了《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的结构和内容, 是发展伊朗仲裁事业和完善伊朗现代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举措。

### (一) 伊朗《国际商事仲裁法》的调整范围

伊朗《国际商事仲裁法》的调整对象为国际商事仲裁关系, 所以该法从“商事”和“国际”两个层面厘定其调整范围。所谓“商事”的概念, 按照《国际商事仲裁法》第 2 条的规定而被广泛地定义为“任何提供或交换商品或劳务的货物交易; 销售协议; 商事代表或代理; 租赁; 咨询; 设计; 许可; 投资; 融资; 银行业; 保险等相关活动”, 这一规定与《示范法》对“商事”的解释基本一致<sup>[5]</sup>。但对“国际”一词的解释, 伊朗《国际商事仲裁法》和《示范法》有很大出入, 根据该法第 1 条 b 项的规定, 所谓“国际仲裁”是指仲裁的一方当事人在订立仲裁协议时为非伊朗自然人或法人。而《示范法》第 1 条第三款规定: “一项仲裁是国际性的, 如果 (a) 仲裁协议双方当事人在签订该协议的时候, 它们的营业地位于不同的

国家; 或者 (b) 下列地点之一位于双方当事人营业地共同所在的国家之外: ( ) 仲裁协议中或根据仲裁协议确定的仲裁地; ( ) 商事关系义务的主要部分将要履行的任何地点或与争议的客体具有最密切联系的地点; 或者 (c) 双方当事人已明示约定仲裁协议的客体与一个以上国家有联系。”<sup>[6]</sup>对比《示范法》的规定, 可见伊朗《国际商事仲裁法》对“国际仲裁”所下的定义非常之狭窄。所以, 从伊朗对国际商事仲裁中“国际性”的限定来看, 伊朗所指称的“国际仲裁”实质上并不包括外国仲裁, 而只调整国内仲裁, 只不过这种国内仲裁具有一方当事人为非伊朗国民的有限“涉外性”。这一特征从伊朗《国际商事仲裁法》的其他一些规定中也可以探知, 例如该法第 6 条规定, “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只能向作为仲裁地的省首府法院提出”, 明确限定了伊朗国际商事仲裁的仲裁地只能位于其境内的某省首府。

### (二) 伊朗《国际商事仲裁法》的具体内容

如同伊朗官方所宣称的那样, 伊朗《国际商事仲裁法》很大程度上模仿了《示范法》两者在具体内容和结构上均有很多相似之处, 甚至说伊朗《国际商事仲裁法》是《示范法》的伊朗版也不为过<sup>[7]</sup>。伊朗《国际商事仲裁法》吸收了《示范法》中许多为国际社会广为接受的仲裁规则, 例如: (1) 《国际商事仲裁法》不仅承认仲裁条款的效力而且承认仲裁协议书的效力 (第 1 条); (2) 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均为《国际商事仲裁法》所规定的合法仲裁形式 (第 3 条), 而临时仲裁至今在我国仍没有合法地位; (3) 《国际商事仲裁法》规定了当事人自己设定仲裁程序的权利 (第 19 条) 和自由选择争议应适用的实体法的权利 (第 27 条); (4) 还规定了仲裁条款的自治性原则 (第 17 条)、仲裁地法院在仲裁程序中有限监督和适当襄助的原则以及平等对待争议当事人的原则 (第 18 条)。另外, 伊朗《国际商事仲裁法》的内容甚至比《示范法》有一些更完善的地方, 比如该法对多方当事人仲裁 (第 11 条第 6 款) 和仲裁第三人 (第 26 条) 均作了规定, 而这些内容在《示范法》中都付之阙如。

而就国际商事仲裁的实践而言, 不少伊朗仲裁员也认为意思自治应为统治国际商事仲裁程序法的最高原则, 或者说意思自治本身已构成无须其他法律批准的自成一体国际法规范, 从而具有高于国内仲裁程序法的效力。例如, 在一起仲裁案中, 一名独任仲裁员审理一起私人主体与政府主体之间的仲裁, 他不得不决定政府主体是否在本案中具有仲裁管辖豁免权。申请人认为国家豁免应由作为仲裁地的瑞典法律决定, 对此该独任仲裁员作出如下阐述:

“我看不到对该问题诉诸任何国内法或国内法院实践的必要,作为仲裁员,我并非任何国家机关的代表,我所有的仲裁员权力都来源于当事人的仲裁协议,我的行为也与任何国家不相干。仲裁协议是我的力量源泉。”可见该案仲裁员认为任何国家的仲裁法都不适用于仲裁活动,支配仲裁的只有当事人间的仲裁协议,意思自治本身构成了作为裁决法律效力来源的仲裁程序法。但还有些伊朗学者认为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因为“《纽约公约》第5条第4项的规定旨在消除人们对仲裁裁决只有遵守仲裁地的所有法律,方可予以承认与执行的疑虑,而不能任意扩大解释”。当然,如果《纽约公约》的规定为大多数国家在仲裁程序法的适用上广泛接受,那么它或许也构成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其实,明确规定当事人有权选择仲裁程序法的立法并不多见,相反,多数国家都希望对其领域内的仲裁施加控制,要想取消国家对其领土内进行的仲裁予以控制的主权权力是不可能的。我国学者就曾认为:“近几年来,相当多的国家非但没有放松对本国领土内的仲裁的控制,反而通过仲裁立法明确规定,在其领土内进行的仲裁或确定为仲裁地的仲裁都应适用本国仲裁法,而并不因当事人对仲裁程序法的选择而排除仲裁地法的适用。”<sup>[8]</sup>所以,至少在严格意义上的仲裁程序法的确定上,当事人选择仲裁程序法的规定并未被广为接受,从而演变为一项国际法规则。虽然当事人可以通过缔结具有法律作用的仲裁协议来创设程序性法律权利与义务,但这种法律权利与义务并不能存在于真空中,它必须存在于调整诸如合同的效力、适用和解释,并且能用以补充其明示规定的某一法律体系中<sup>[9]</sup>,而意思自治原则并不构成这一法律体系。

(三) 伊朗《国际商事仲裁法》拒绝执行及撤销仲裁裁决的条件

伊朗《国际商事仲裁法》对拒绝执行仲裁裁决和撤销仲裁裁决规定了相同的条件。根据该法第33条第1款b项的规定,仲裁裁决作出后任一方当事人均有权向法院提出执行、拒绝执行或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法院不能依职权主动提出对仲裁裁决的撤销和不予执行。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如果认定仲裁裁决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将裁定仲裁裁决被撤销或不予执行:(1)仲裁协议的任一方当事人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2)根据伊朗法,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是无效仲裁协议;(3)伊朗《国际商事

仲裁法》对任命仲裁员及适当通知当事人提出仲裁请求的规定没有被遵守;(4)申请拒绝执行或撤销仲裁裁决的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未能在仲裁程序进行时出席仲裁庭;(5)仲裁员对当事人未提交仲裁的事项作出仲裁裁决,仲裁员的越权裁决无效。仲裁员的越权裁决如果可以 and 未超越权限部分的裁决相分离,未超越权限部分仲裁裁决不受影响;(6)仲裁庭的组成和仲裁程序与仲裁协议的约定不符,或者仲裁协议对此没有约定时与本法的规定不符;(7)如某仲裁员对仲裁裁决作出肯定性结论,而该仲裁员在仲裁中被仲裁地的省首府法院替换;(8)仲裁庭据以作出裁决的书面证据是伪造的;(9)提起仲裁裁决不予执行或撤销一方当事人的对方当事人故意隐匿对案件结果有重大影响的关键性书面证据,且该证据在裁决作出后被发现;(10)当事人提交仲裁的争议根据伊朗法律规定属不可仲裁事项;(11)仲裁裁决违背伊朗的公共政策或善良风俗或者违反伊朗《国际商事仲裁法》中的强制性规则;(12)仲裁庭作出的涉及伊朗境内不动产的仲裁裁决不得与伊朗法律和生效的法律文书相矛盾。上述12项条件,其中第7、8、9和12项都是《纽约公约》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条件中没有的,第11项条件则除《纽约公约》规定的公共政策之外,又添加了仲裁裁决不得违反善良风俗的限制。

(四) 伊朗政府机关作为主体缔结仲裁协议的能力

伊朗《国际商事仲裁法》并未直接涉及伊朗国家、政府或其他官方机构与他方当事人缔结仲裁协议能力的问题。该法仅规定当事人提交仲裁的事项不得影响伊朗强制性法规的实施,但何谓违反伊朗的“强制性法规”该法并没有直接说明<sup>1</sup>。

要回答这一问题,须借助伊朗《宪法》的相关规定。伊朗《宪法》第77条规定“凡伊朗国缔结条约、协议、议定书以及合同须经伊朗议会同意”;第139条则规定“将任何涉及政府和公共财产的争议提交仲裁或其他争议解决方式必须经伊朗部长会议的同意并告知伊朗议会,如果争议的一方当事人为外国人或者虽然双方皆为伊朗人,但案件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则仍须经伊朗议会同意。法律将对所谓的重要案件予以明确”。因此,如果与伊朗政府缔结有投资协议的投资者希望利用仲裁的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投资争议,至少须满足下列三个条件之一:(1)要求伊朗政府取得伊朗议会的同意,这一要求

<sup>1</sup> See Hamid G. Gharavi Salas, The 1997 Iranian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The UNCITRAL Model Law, at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1999 Vol 15 No 1, p. 87

通常可以得到满足,例如 1981年 1月 14日伊朗议会授权伊朗政府将伊朗与美国政府的金融法律争议提交仲裁,1981年 8月 10日伊朗议会授权伊朗中央银行将其与菲力浦兄弟公司的争议提交仲裁等;

(2)投资者所属国与伊朗缔结有以仲裁方式解决投资者与伊朗政府间投资争议的双边条约或协定;

(3)该投资争议属于伊朗新颁布的《外国投资法》的调整范围,该法规定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仲裁、法院救济等方式解决与伊朗政府间的投资争议。

另外,尽管伊朗宪法对伊朗政府缔结仲裁协议的能力有限制,但外国投资者可与伊朗政府缔结仲裁地位于伊朗国外,仲裁裁决也无须在伊朗境内承认与执行的仲裁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政府不能以其宪法限制为由否定其缔结的仲裁协议的效力,目前实践中已有多起这样的案例,比如 1986年国际商会仲裁院作出的 3481号仲裁裁决中,伊朗某政府实体以仲裁协议未获得伊朗宪法所要求的认可为由拒绝受仲裁协议的拘束;仲裁庭则认为国际公共秩序强烈禁止政府实体在公开和自愿的情况下先与私人实体缔结仲裁协议,而后企图以其国内法的规定为由主张仲裁协议无效,因为这对私人一方当事人是极端不公平的<sup>[10]</sup>。在 *Société Gatoil v National Iranian Oil Company*案<sup>[11]</sup>中,法国上诉法院拒绝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援引伊朗宪法否定其缔结的仲裁协议的效力,该上诉法院也同样认为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行为违反国际公共秩序。

实际上,私人主体与伊朗政府机关的争议绝大多数属于投资争议,而 1965年华盛顿《关于解决各国和其他国家国民之间投资争端的公约》(简称《华盛顿公约》)则为解决国家与外国投资者争议的专门公约,该公约目前已有 100多个当事国,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在解决国际投资争端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伊朗至今未加入该公约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 (五)伊朗加入《纽约公约》的重大意义

伊朗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拒绝加入《纽约公约》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其吸引外国投资及扩大对外贸易的优惠政策,在此情况下外国投资者一般会拒绝与伊朗当事人在伊朗进行仲裁,因为即使外国人在伊朗仲裁胜诉,他也可能面临两种不利情形:

(1)伊朗当事人可能利用伊朗《国际商事仲裁法》中撤销仲裁裁决的宽泛条件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2)外国人在伊朗获得的有利裁决难以在《纽约公约》的其他缔约国得以执行,从而减损其应得利益。

实际上,伊朗加入《纽约公约》并不会承担任何

法律风险。《纽约公约》本身不提供任何自动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机制,外国仲裁裁决只有通过内国法院的裁定才有可能被承认或执行,也就是说《纽约公约》作为国际法文件并不直接适用于成员国,成员国可通过转化或并入的方式承担其公约义务。而且《纽约公约》规定的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条件也具有相当弹性,它的有效实施仍有赖于缔约国司法机关的善意执行。如公约第 2款(h)项即规定“如果被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国法院认为裁决违背法院地国公共秩序,则可拒绝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伊朗司法机关可根据本国法律确定何谓“违反公共秩序”。

#### 三、伊朗仲裁法发展的未来展望

加入《纽约公约》后,伊朗必须履行公约义务,对国内法中与《纽约公约》不符的地方进行修改。另外,伊朗又是一个地区大国,与中亚邻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很有希望成为该地区的仲裁中心,但伊朗仲裁法律制度中一些不合时宜的规定限制了他在国际仲裁舞台上的发挥,对这些规定进行修订也势所必然。综合起来,伊朗仲裁法可望在以下一些方面有所发展:

(1)可加入《华盛顿公约》利用公约的仲裁机制解决伊朗政府机关与他国国民间的投资争议;

(2)删去《国际商事仲裁法》第 33条第 2款 7 & 9项的规定,使该法拒绝执行及撤销仲裁裁决的条件与《纽约公约》的规定相一致;

(3)扩大伊朗国际商事仲裁的外延,使伊朗的国际仲裁真正包括外国仲裁,具体可参照《示范法》的规定进行修改;

(4)剔除仲裁只能在伊朗某省首府进行的规定,当事人可自由约定仲裁地点。

尤其是有关于仲裁地的确定,伊朗学者认为也应借鉴法律意义仲裁地的做法,摒除传统的地理意义上仲裁地的概念。法律意义上的仲裁地作为仲裁与特定国家法律制度间的连结点,其法律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仲裁地是确定仲裁法适用空间范围的主要连结因素,各主要仲裁立法纷纷规定该法适用于仲裁地在其领域内的仲裁,因此仲裁地决定支配仲裁的仲裁程序法(法庭法);其次,仲裁地决定哪国法院有权对仲裁实施司法监督与支持,尤其是仲裁裁决的撤销权一般由仲裁地国法院行使,这是公认的仲裁法律原则,因此确定了法律意义上的仲裁地,基本就等于确定仲裁裁决由何国法院管辖,单纯的仲裁程序进行国一般不能对裁决实施这种司法撤销权,即使强行撤销,也不会得到执行国的承认,并不妨碍裁决在他国的承认与执行;再次,仲裁地决定仲裁裁决的国籍, (下转第 122页)

间的差距越大,穷人的状况也就越差,这也就有悖于相互有利的结合初衷以及民主平等的原则。所以公共利益是否正当正如罗尔斯所指出的那样:“确立和保证那些状况较好的人的较好前景,除非这样做适合于那些较不幸运的人的利益。”<sup>[22]</sup>

参考文献:

[1][法]霍尔巴赫. 自然的体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259- 260

[2]陈新民. 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18

[3][4][10][11][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19 21, 3- 7, 24 20

[5]胡建淼. 公共利益概念透析[J]. 法学, 2004 (10).

[6][英]边沁. 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58

[7][法]卢梭. 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137.

[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292 292

[12][13][22][美]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14 4 76

[14]张千帆. 公共利益是什么? ——社会功利主义的定义及其宪法上的局限性[J]. 法学论坛, 2005 (1): 28- 31

[15][美]汉密尔顿, 杰伊·麦迪逊. 联邦党人文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264

[16]张千帆. 宪法学[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 35

[17][18][19][法]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252 252 252

[20]J.Maritain The Rights of Man and Natural Law [M]. New York 1954 67.

[21][美]埃尔斯特, [挪威]斯莱格斯塔德. 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121.

责任编辑: 邵东华

(上接第 117 页)纽约公约调整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 但何谓外国裁决, 一般由仲裁地决定, 仲裁地国不能适用纽约公约承认与执行本地裁决, 除非仲裁适用非仲裁地程序法, 但这种可能性在实践中基本被排除了。

参考文献:

[1] See Koran, IV, 351.

[2] See Davil Suraigu, Arbitration in the Iranian Legal System (1965) 20 Arb J p 144

[3] See Hamid G. Gharavi Salaş The 1997 Iranian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The UNCITRAL Model Law, at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1999 Vol 15 No 1, p. 85

[4] See Davil Suraigu, Arbitration in the Iranian Legal

System (1965) 20 Arb J p 145

[5][8]韩健. 国际商事仲裁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0 19 264.

[6]姚梅镇. 国际经济法概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9 665

[7] See Davil Suraigu Arbitration in the Iranian Legal System (1965) 20 Arb J p 147.

[9] See C. Chatterjee The Reality of the Party Autonomy Rul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03( 6), p 553.

[10] See 1986- 1990 Collection of ICC awards 263- 267.

[11] Ct App of Paris 17 December 1990 (1993) Rev. de 'Arb 280

责任编辑: 闻 刚